

反腐立法要“快”更要“准”

3月9日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读“未来5年的立法规划”时，提到“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，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”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。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败立法的时间表。这一天，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《反腐败法》的议案，恰满14年。

从14年前的建议性的议案，到如今正式确立5年期的反腐立法时间表，说明我国反腐工作法制化、制度化的路径日益明晰。事实上，对反腐立法的重要性，中央领导同志近期的讲话中早有体现，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，“坚持‘老虎’‘苍蝇’一起打”，“信任不能代替监督”，说明反腐制度建设势在必行。为反腐立法设立时间表，是新形势下反腐工作的迫切要求，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。

近年来，在反腐高压态势下，一批腐败分子被依法查办。如今年发布的“两高”工作报告中，法院审结贪污贿赂、渎职犯罪案件13.8万件，判处有期徒刑14.3万人；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中，厅局级有950人、省部级以上有30人。这些数字，表明了我国对腐败“零容忍”的决心和实效。

纵观我国30年的反腐历程，以制度反腐并不是一个新课题。事实上，近些年我国也出台了具体的预防、惩治腐败的制度规定，但往往层级不一、太过分散，导致产生一些诸如“违纪不违法”、“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处罚”等的制度性漏洞。如此，惩治腐败的精准度、威慑力必然减弱，实施效果不容乐观。

要让反腐立法更精准更有效，首先离不开阳光行政、透明决策、舆论监督、权力制衡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撑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反腐立法需要的不仅是一部法律，更需要从多层面完善法律运行的环境。

其次，在惩治腐败的同时，更要从法律层面预防腐败，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。正如一些代表委员所言，“反腐不能割韭菜，割掉一茬又长一茬，关键在于除掉根、铲掉土。”要对腐败“斩草除根”，就当从制度上约束权力运行，从源头上治理腐败，“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”。

第三，要广泛借鉴国际社会一些经过检验的立法实践。如美国的“从政道德法”、1977年涉外贿赂法，英国的“荣誉法典”、“反腐败法”，德国的“利益法”、“回扣法”等，这些法典既重事后惩治，更重制度预防，我们可以从其实施多年总结的得失中吸收营养，为我所用。

立法反腐提上国家日程，说明我们反腐败的法律“笼子”正在编制。这个过程中，更需要立法者能够以阳光公开的方式，整合专家资源，吸收民间智慧，确保各方力量参与，为反腐败法的设立打个好基础。

铁路改革，有“名”更要有“实”

备受瞩目的第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摘下面纱，铁路系统将实现政企分开。铁道部现任部长盛光祖表示，铁路票价一直偏低，今后要按照市场规律，企业化经营来定票价。(3月11日《京华时报》)

铁路公司化、市场化后，火车票是不是要借此涨价，成了百姓最关心的话题。不少人担心铁路公司化、市场化后“低价票”与铁道部一起成了人们永远的回忆，因为铁道部门所说的“票价偏低”、债台高筑、继续建设投资等种种理由都有可能成为票价上涨的理由。

然而，百姓最担心的还是市场化改革后送走“铁老大”，会不会又迎来“铁垄断”，担心火车票涨不涨价不是依据成本和供求，而是靠垄断式的“涨价没商量”。

市场化是改革方向，这迈出了打破“铁老大”的重要一步。但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引入竞争，通过竞争来提高管理效率、降低运行成本，最终形成合理市场价格。如果铁路市场长期一家独大，“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”，市场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，改革最后只能沦为“换汤不换药”，反而为票价上涨找到了市场的借口。

之前航空、电信、石油等领域的改革经验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改革效果和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体系有直接关系。航空公司遍地开花，航空票价折扣优惠不断；电信分拆，竞争日趋激烈，价格不断下降；成品油市场“两桶油”独大，消费者对价格、运行效率却是诟病不断。

目前，我国的人均铁路里程还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，铁路建设“任重道远”。但至去年三季度铁道部高达2.66万亿美元的负债让人们意识到，主要依靠政府支持的融资方式难以维系，要堵这个债务“窟窿”，引入民间资本还是关键。如果能借此契机，引入民间资本形成更多民营铁路建设、运输公司与国家控股铁路公司同台竞技，改革可在解决融资、提高效率等方面“一举多得”。

此外，在铁路市场化运行之初，市场竞争不完善之时，政府部门对铁路运价、国有铁道企业运行效益及服务水平的监管也十分必要，不能让“铁垄断”一边大喊亏损要求提价补贴，一边却拿着高福利搞腐败，更不能一边人为制造运力紧张供不应求，一边却疏于管理借机要政策、搞涨价。

留影铁道部人们在想什么？

3月10日铁道部将撤销的消息传开之后，不少人聚集在位于北京复兴路10号的铁道部门前拍照留念，来者有铁路系统员工和退休职工，有外地赶来的铁路爱好者，更多的是每年都免不了跟“铁老大”打几次交道的普通市民。一时间，铁道部门俨然成了“景区”。

有人这样调侃：“铁道部，生于1949，卒于2013”。1949年10月，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成立，是共和国政府成立最早的部门之一。运输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，免费搭载过大串联的红卫兵，近年又成为逢年过节全民吐槽的对象，而今，铁道部和它门前的那块牌子都将成为历史。

现在，铁道部对外界来说是“政企不分的典型”，但在铁路系统职工看来，它却是几代“铁路人”的身心归属。比如合影留念者之一陈乃武，毕业就来到铁路系统工作，已25年，“我们一直都是铁道部培养的，感情很深”。

最后一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已承诺铁路职工“不存在安置问题，都在就业岗位，也不会裁员”。但绝大多数铁路职工作为未来“中国铁路总公司”的一员，与充满集体色彩、使命感的“铁路人”相比，感觉可能会是两样。这种感情在一些铁路退休职工身上尤为强烈。他们留恋铁道部，其实是在留恋自己曾经的一段人生历程。

但更多的普通百姓是带着什么心态，来铁道部门前留影呢？人是喜欢怀旧的，身边任何一种事物即将消失时，人们都会有留恋的冲动。“再不合影，就没机会了”，也许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态。

人们留影铁道部，送别出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“铁老大”，更是对铁路未来的期待。铁道部门前，有人接受采访说“早该撤了”，有人摆出“走你style”。也许不久，他们中有人过年回家买不到火车票时，还批评过铁道部。他们应该感受到了，撤销铁道部意味着铁路改革的破冰，让人头疼的买票难等问题，也许有望得到解决了。

“公转”“自转”如何一起转

从媒体上关注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，常常能看到“凝聚共识”、“形成合力”、“协调推进”之类的说法。这其中，包含了对整体和局部、集体和个人等关系的思考。

不禁想起这样一幅漫画：同样的建设工地，同样是挥汗如雨，有的马达轰鸣、机器飞驰，有的却乱作一团、机器纹丝不动。乍看禁不住纳闷，细看方知缘由：工人们虽都在用力，但有一组指挥有序、气顺劲足，另一组却各自为政、杂乱无章，其结果自然相去甚远。漫画中所表现的尴尬，或许有艺术的虚构，但现实生活中，“各吹各号，各唱各调”的现象，却并不少见。

这里好有一比：围着中心转，服务大局干，有如“公转”；自我为中心，眼睛向内看，如同“自转”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，不同程度存在将“公转”与“自转”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。有的认为全局、大局只是“上面的事”，只顾盘算自己的“小九九”；有的觉得与其围着别人转，不如自己“捞着干”更实惠；还有的把“公转”看成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“自转”才能取得高回报高收益。凡此种种，于大局不利，对事业有害。

其实，“自转”与“公转”并不矛盾，高效的“公转”往往建立在良好的“自转”之上，正是因为一个个精彩的“自转”，成就了有如大合唱一般的雄浑“公转”。比如，有的地方和部门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自身实际相结合，因地制宜、彰显特色，干出了一番上上下下都满意的成绩。可见，做好工作、推进事业，既需要识大体、顾大局的“公转”，又需要有

针对、合实际的“自转”。

“如果集体的成员把集体的前景看作个人的前景，集体愈大，个人也就愈美，愈高尚。”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名言，今天依然很有道理。试想：一个地方、单位或是部门，如果总是站在部门利益的角度，整天只想着小团体的利益，片面强调本地区、本部门工作的“特殊性”，甚至希望全局利益服从自己的局部利益，只会给我们的发展造成损害，最终全局利益也难保。如果我们的各级党员干部习惯于画地为牢，跳不出那一片小天地、小圈子，又怎样去把握全局，创造经得起实践、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业绩？

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，在事物的发展中，全局起着主要的、决定性的作用，它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。因此，全局高于局部。全局理顺了，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局部。这正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言：“事物整体的力量比任何单独的个人的力量更强大，正如我们的共同因素比我们自己的志趣更强大一样。”

道理并不难懂，关键在于付诸实践。如何真正做到胸怀大局，摆正位置，在“谋一域”时更多更好地“谋全局”？如何在全局与局部、集体与个人、长远与眼前发生矛盾乃至碰撞时，统筹协调好“公转”与“自转”，从而让“共同因素”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？

“上下同欲者胜”，发展过程中，既要照顾局部、保障个体，也要服从和服务于大局，“公转”“自转”相互配合、同舟共济，才能“转”得顺、“转”得好。简言之，围着中心转，就能转出巨大向心力；聚在一块干，必将聚合强大正能量。

邹贤启

“求同”允许“存异”

两会至今，共采访了20多位人大代表。翻阅采访笔记，发现多位代表都在谈热点问题，比如大气污染怎么治、食品安全谁来管、房地产如何调控等。当然，对同一问题，代表们的意见往往是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

有的问题，比如治理雾霾，大家在态度上基本一致，只不过具体建议各不相同。有的问题，观点差异巨大，甚至针锋相对。如房地产调控，有代表认为，“应当减少调控，让市场来决定价格”；有代表则认为，“政府调控的力度还不够，应该丰富调控手段，加大力度”。

有人担心，人大代表的意见如此相左，会不会使会议的质量和效率大打折扣？这些担忧可以理解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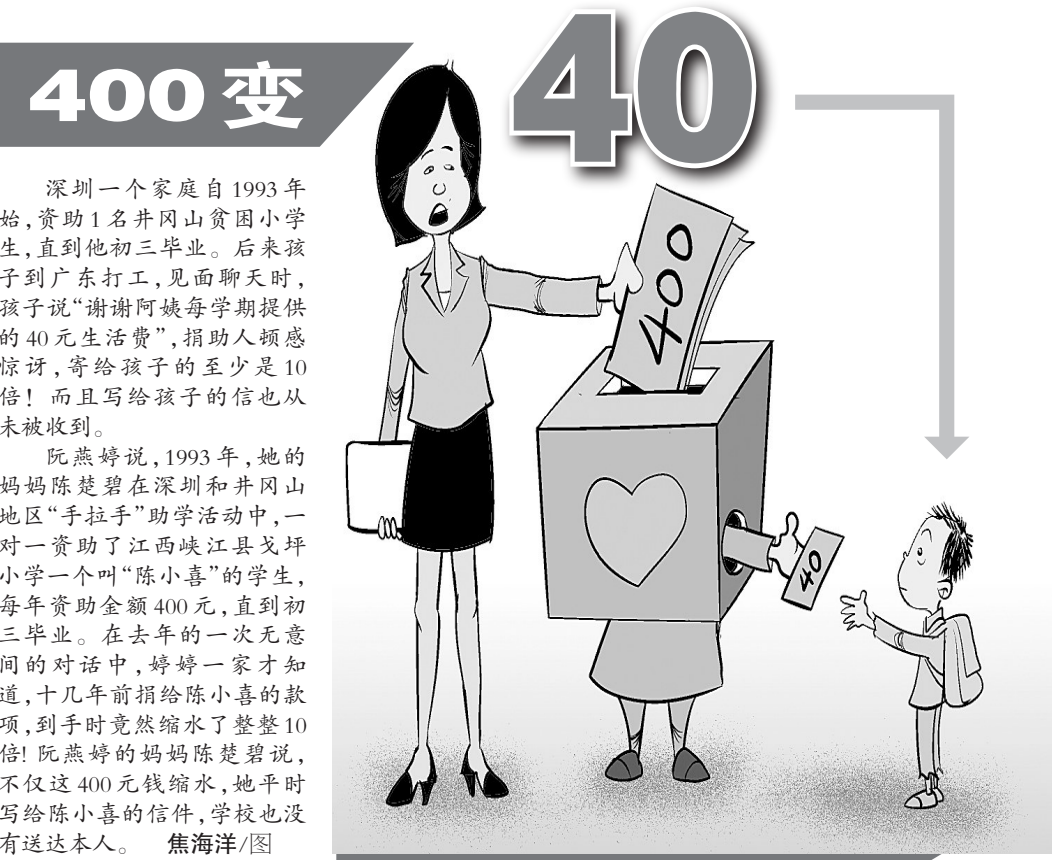
一些议案、建议主题出现同质化，恰恰说明这是社会关注、百姓关切的热点话题。而这类问题，往往关系不同群体的利益，其成因并非一端，解决办法也并非一途。在这些热点问题上的全国两会，恰恰表明代表们基于各自的角度，作出了不同侧面的思考。正视并尊重这些差异化的观点，为审视问题提供了丰富视角，更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多种思路和办法。

人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、地域、职业、教育背景等并不相同。这使代表大会制度拥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，为充分实行人民民主提供了必要条件。代表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，所代表的群体不同，思考、处理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会相同。观点不同很正常，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很有必要。

按照法律规定，全国人大代表在行政决策前、决策中、决策后都可以通过提意见建议、质询、询问等方式依法监督。因此，在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充分“存异”的基础上，重大决策才能最大限度“求同”。

站在所代表群众的立场上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、议案，为政府决策传递社情民意，当好上传下达的桥梁，是代表们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代表们对事务、问题各抒己见，就可以多提供一种声音、多提供一种选择、多提供一种参考，就能让决策更全面地体现民意。

彭波



农村缘何成为“山寨乐园”？

“3·15”又要来了，如火如荼的打假活动正在各大城市竞相上演。城市维权声音高涨，假借横行的广大农村却鲜有发声。

康师傅“博”方便面、“飘柔”洗发水、“劲”饮料……层出不穷的山寨品让人眼花缭乱，造假技术让人啼笑皆非。然而，这些假冒商品在农村却大有市场。在农村集贸市场和便利店，山寨品以低廉的价格、以假乱真的外观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农民前来购买。

农村成为山寨假货乐园，一方面源于巨大市场需求。近年国家出台各项惠农政策，让农民钱袋子逐渐鼓了起来。富裕起来的农民，更多追求提高生活品质，对日用品的消费需求日益扩大。这就给山

寨货以可乘之机。而对山寨假货，有些农民朋友维权意识不强，认为“只要能耐用就行”、“吃不死人就没事”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“无所谓”的消费观纵容了假货横行。

另外一方面，假货市场的巨大利益链条，较低的违法成本，让一些不法生产和经销商铤而走险。

农村消费市场广阔，农民挣钱不容易，工商、消协等维权部门要把农民切身利益真当回事，把打假重拳从城市向农村转移。打假要“发现一起、处理一起”，但不能仅停留在销毁假冒伪劣劣产品；除了要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外，还要从根源做起，矛头直指假货生产商。只有斩断假货商品背后的生产销售黑手，才能让农民吃得放心，用得安心。

冯国栋

税负只增不减的“错觉”由何而来

“我觉得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个人，中国的税负还是很重的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广州市工商联兼职主席袁志敏在被问及对中国税负有何看法时，直言不讳地说，过重的税负令企业承受巨大的经营压力。

虽然支持征收房地产税，全国政协委员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赞同结构性减税。他认为，目前中国的税负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，对富裕阶层征收的税负相对国外来说显得较轻。

两会上的税负之争不时可见。前几天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企业家甘连舫在分组讨论时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。同组的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兰兰现场回应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已经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，继续提高起征点不可能。

全国人大代表赵冬琴则提出了议案，建议人大收回个税立法权。这份议案揭示了一个不为大众熟知的事实——现有的18个税种中，只有少数税种由全国人大立法批准，其他都是授权国务院作暂行规定或条例。

国家财政的增长显而易见。十几年里，GDP从当初的几万亿，增长至现在的50多万亿；税收也从原来的万亿级，增长至现在的十几万亿，税收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。与此同时，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缩小贫富差距，人们还不时听到各种增加新税种的建议，诸如房产税、房产税、排污税之类，而很少看到减税的举措——纳税人的婚姻、家庭、子女负担和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减税因素，尚未在个税中有体现。

两相对比，不难看出，人们更倾向于认为，这两年，也确实减免了一些，而征税容易减税难的错觉，主要是因为许多税收并没有征得纳税人的同意——未经人大立法同意的一些税收，实际上绕过了纳税人知情这一关。一些地方这几年试点的房产税等，就大多存在这一缺陷。

行政部门有着天然的扩权冲动，税收越多，政府口袋里的钱就越多，花钱就越容易。尽管人大可以授权相关部门立法，但税收立法权的“旁落”，是长期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，行政机构绕过漫长的立法程序，出台各种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，导致税负只增不减。

“无同意，不纳税”的税收原则，早在数百年前的代议制政治中就已确定。不管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、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、法国的大革命，还是中国历史上反抗皇权捐税的起义，都与税收无关。因而，温家宝总理才会说：“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。如果你读它，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，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。”

税收并不是越少越好，也并非越多越善。为什么征税，征收的各种税都用于何处，纳税人要知情。两会中，认真审议、讨论政府预算报告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，说明纳税人的权利正在得到尊重。看好了“钱袋子”，让政府不乱花钱，纳税人缴纳税来才能心甘情愿。

政府需要靠赋税来运转，公民的各种权利和福利，需要公共财政来保障。纳税是义务也是权利，作为公共与立法机构，人首先就是议税的地方。哪些该征，哪些不该征；哪些税种可以增加，哪些税收应该减免；都应该拿到两会上来议一议。征税的立法权属于人大，其“下放”的权力是否该收回，也需要好好议一议。让纳税人参与，广泛听取民意，符合立法程序，税收才有合法性；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纳税人才不会觉得税负重。

冯雪梅

碎片化议政如何被吸纳

两会热闹的信息海洋里，每天都会看到无数种声音，七嘴八舌各抒己见。有时候一个声音还没被倾听就被关注，迅速就被另一个声音淹没；一个提案还没被充分讨论，很快就被另一个提案所遮掩。这种喧嚣嘈杂的舆论场中，每人几分钟发言的小组讨论中，一些话题被碎片化，部分议政被琐碎的陈述和浅层的批评所淹没。

这种碎片化，是两会舆论场所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。民众平日的表达机会不多，媒体热衷于“终于逮着官员”的两会效应，一些代表委员还没有养成日常议政的习惯，便使只有10多天的全国两会，发生了严重的民意拥堵。大家都想赶着在这几天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争相借助两会效应放大自己的声音，抢话筒和争“眼球”是必然的。

让人担忧的是，在这种众声喧哗的民意中，有些议题被碎片化了，成为零乱的话题罗列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如何能起到应有的议政效果？如何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？

解决碎片化议政，首先要让民意能有更多日常表达的机会，创造条件让民众的批评和监督传达到政府耳中。民众平常有理有处说，有话有处讲，有维权渠道，民意在日常得到疏导，自然就不会堵在两会上了。

政协委员葛剑雄说：形形色色的各类问题被带到全国两会，让两会承载了许多不应由其背负的内容。有些议案、提案，所议之事，所建之言，是法律早已明确的政府职责，对人大来说，该是问责；对政协来说，则是监督。还有一些问题，太地方化、部门化了，实不该占用全国两会这个宝贵平台和时间。日常渠道的闭塞，让两会拥挤不堪，既让话题碎片化了，也影响了议政的效率。

解决议政碎片化的问题，也需要代表委员们提高自身议政素养，提高议政质量，让议政从“发几句牢骚”变成“建设性的议政”。代表委员议政要超越发牢骚，要有严谨的调查，提出真问题，拿出可操作的方案。而且要持续关注一个问题，而不是看到什么就追什么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议政碎片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低质化的结果。

最后相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回复，代表委员提出问题，被监督的部门要好回答问题，给出时间表，让问题一个个地得到解决，不能让那些提出的问题在两会后就烂尾。一步一个脚印，让碎片化的议政被制度化地吸纳。

曹林

大片票房悲惨怨不得观众

获得3项奥斯卡奖的音乐大片《悲惨世界》在中国上映后的前期票房仅达《西游-降魔篇》的十分之一，有人评论质疑：一部世界名著，一帮大牌明星，缘何水土不服？他们得出的答案是：年轻人宁打游戏不愿“悲惨”，观众教育程度不够，欣赏水平太差……

这样的反思当然是有价值的，其观点也不无道理，但存有漏洞：全世界年轻人都喜欢打游戏，都忽视传统音乐教育，为何《悲惨世界》在其他地区票房尚可？

出现问题，不调查实证，而是根据几个假设，推理一番便得出结论，难免走入大而无当的误区。以该案为例，年轻人喜欢游戏、欣赏水平差等都是大话题，短时期内没有解决方案，既然解决不了，除了满足一下优越感，这样的归因意义何在？万一找错了原因，怎么自反？

应该警惕，大话题往往容易遮蔽解决方案的智慧，造成严重的判断失误。

可以看到，在分析中，人们预设了这样几个前提：首先，大片一定有市场；第二，奥斯卡获奖，明星多，就一定是大片；第三，别的市场反响不错，中国市场应该也反响不错；第四，如果反响冷淡，那就一定是中国观众有问题；第五，中国观众有问题，就应该问责教育、文化、传统。

正是这一连串的逻辑，一定，得出了“必然”的结论，可事实真的如此绝对吗？事实上，艺术欣赏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心理与欣赏习惯，如果拍摄一部京剧大片，也是名著加名角担纲，又有多少美国观众能接受？

其实，电影《悲惨世界》与原著差距颇大，人物性格变化过于戏剧化，为炫耀音乐元素，弱化了书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，它不过是一部名著包装的商业片，市场不成功，应追问其宣传、品质、市场定位、本土化的责任，怎么能反过头来批评消费者？

不否认，应该努力提高欣赏水平，但也不能走入文化自卑的心理中。要看到，今天年轻人虽然经典阅读减少了，但他们视野更开阔，对世界更了解，更有选择的勇气，这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取得的宝贵成果，应予珍重。

事实证明，外国大片来一部火一部时代早已过去，不了解本地市场特性，拿不出有针对性的产品，遇冷纯属活该。

蔡辉